

专家治国：技术专家抑或知识分子？

周千祝¹，梅其君²

(1.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2.贵州大学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关于专家治国论的专家主体,学界有三种不同理解:一是认为专家仅指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二是认为除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外,还包括社会科学专家,特别是经济、管理专家;三是把专家等同一般知识分子。治国专家从科学家、技术专家扩展到社会科学专家乃至人文知识分子是唯科学主义不断扩张、工具理性不断渗透和社会技术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结果。

[关键词]专家治国;科学;技术;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8)02-0010-06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18.02.002

Technocracy: Technical Experts or Intellectuals?

ZHOU Qian-zhu, MEI Qi-jun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2. College of Tourism and Culture Industr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main part of technocracy in academic circle. One is that it merely refers to scientists and technical experts. The other is that it also includes social science experts, especially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experts, besides scientists and technical experts. The last is that it refers to the general intellectuals. The expansion from scientists and technical experts to social science experts and humanistic intellectuals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scientism, the constant penetr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 incessant development of social technicalization.

Key words: technocracy; science; technology; intellectuals

作为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一种政治思潮,专家治国论为很多学者所关注,研究文献亦是卷帙浩繁。但是,在众多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那就是专家治国论中“专家”到底指哪些人?这一问题似乎不言自明。然而在具体问题探讨中,学者们对“专家”的理解并不

相同:有的学者所说的“专家”仅仅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而有的则包括社会科学专家,更有甚者将“专家”等同为一般知识分子。为何人们对“专家”会有这样不同的理解?“专家”从科学家、技术专家扩展到一般知识分子说明了什么?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收稿日期:2018-01-24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文科重大科研项目(GDZT2011009)

作者简介:周千祝(1990-),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梅其君(1972-),男,湖南汉寿人,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哲学与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专家治国论,英语表述为“technocracy”。虽然这一专门术语“technocracy”一词的诞生仅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但专家治国思想渊源可经由圣西门、培根而追溯到柏拉图。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最佳的统治者是哲学王,虽然哲学王与通常理解的治国专家相去甚远,但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统治的思想却是专家治国论的最早萌芽。与柏拉图相比较,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描绘的乌托邦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专家治国论,不过,培根描绘的“所罗门宫”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并不像柏拉图的哲学王那样进行直接统治,而仅仅是给统治者提建议。由科学家、技术专家直接进行统治的蓝图最早是由圣西门描绘的。圣西门看到了科学家、技术人员在工业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主张由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实业家组成的“牛顿议会”进行统治。圣西门的治国专家不仅仅指科学家、技术人员,还包括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实业家,而排除教士和贵族,体现了工业革命时代的特征。曾经担任圣西门秘书的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专家治国论,与圣西门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不同,孔德强调社会科学的作用。孔德认为,社会统治依靠的是科学的知识,而研究社会的科学的知识是社会学和政治学,因而,治国专家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而不仅仅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圣西门等人的专家治国思想在美国传播。1919年,美国工程师史密斯创造了“technocracy”一词。史密斯创造该词是为了表达理性化的工业民主的社会发展历程,其本意是“人民通过他们的公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进行有效的统治”^{[1](P381)}。显然,这里的“专家”是指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亦即那些和工业文明最具亲缘关系的科学—技术精英们。但是,“technocracy”一词经由斯科特在美国发起的专家治国运动而传播开来的时候,偏离了史密斯的本意:“这个词与斯科特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斯科特反过来与索尔斯坦·维布伦联系

在一起……有趣的是,当这个词通过斯科特在全美普遍推广的时候,史密斯却抛弃了它”^{[1](P381)}。

斯科特认为,“technocracy”就是“科学和技术的统治”^[2]。斯科特先后发起成立了“技术同盟”(Technical Alliance)、“专家治国联盟”(Technocracy Incorporated)等组织,他领导的专家治国运动在1933年达到高潮,但这场运动持续时间并不长,1936年以后迅速衰落。斯科特受到了很多批评,他对该词的用法也被史密斯指责为把技术和专制融为一体的“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技术人员的统治”^{[1](P381)}。

斯科特对“technocracy”的解释受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的影响。斯科特与凡勃伦于19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相识,随后便有了以两人为核心的技术专家、经济学家的一系列聚会。作为经济学家的凡勃伦不仅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专家治国论的奠基者。凡勃伦在他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一书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体系与价格体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将工程师的高效与商人的低效、浪费进行对比,认为只有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才能高效运转,断言工程师治国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主张通过非暴力的“工程师革命”使“技术人员的苏维埃”掌握国家权力。与斯科特及同时期的多数专家治国论者把专家的主体规定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不同,凡勃伦所说的专家是指“在技术知识、能力、兴趣、经验等方面有所专长的人”,包括“发明家、设计人员、化学家、矿物学家、土壤专家、农业专家、生产管理人员以及各种工程师”^[3]。

凡勃伦之后,专家治国论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社会学家贝尔等著名学者。加尔布雷斯是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新工业国》一书中分析了企业经营决策权从资本占有者向管理者和技术专家转移的过程,阐述了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认为拥有专门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technostructure)逐渐取代资本家而掌握社

会权力。在加尔布雷斯的“技术结构阶层”之中,专家成员的来源又十分广泛,“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技师,还有营业员、广告员、推销员,有对外联络员、法学家、对华盛顿官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有调解员、经理、董事”^[4]。

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的“能者统治”实际上也是一种专家治国论。在贝尔看来,“如果说过去百年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物一直是企业家,商人和工业经理人员,那么‘新的人物’就是掌握新的智力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1](P375)}。贝尔对凡勃伦的专家治国论的片面性和机械性进行了批判,在专家主体的认知和规定上更多地强调掌握理论知识的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而非一般的技术人员。

20 世纪专家治国论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其它国家。在前苏联,“专家治国论”在 1920 年代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这场运动以牵涉到“沙赫特案件”和“工业党事件”事件中的工程技术人员被判刑而告终^[5]。非常明确,前苏联的专家治国论及其运动中的“专家”是指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瑞典,缪尔达尔和米达尔在早期的著作中也倡导专家治国论,像孔德一样,他们的治国专家主要是社会科学家,而不是技术专家。他们还看到了专家治国论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危险,力图使二者融合^[6]。

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专家治国论者“主要聚焦于如何运用科学技术加强既有秩序”,失去了批判向度的专家治国论“沦为纯粹的政治或治理手段技术化的主张”^[7],它可以与多种政体相结合,这有利于它扩散并影响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活。在东盟国家,专家治国现象普遍存在,尽管不同国家的专家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在不同国家,人们对专家主体的认知也不一样。在有些国家,专家主要是指经济学家,而在另一些国家,专家指有学术水平或有专业知识的人^[8]。与东盟国家类似,在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巴西等拉美国家,治国专家也不局限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自上世纪六

十年代以来,尤其是最近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期间,经济专家已经成为拉美民主政治中重要的行动者”^[9]。

二

我国学界对专家治国论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倡导专家治国论,“1922 年胡适等人所倡导的‘好政府主义’的简短实践可以理解为他们在中国鼓吹专家治国论的最初尝试”^[10]。《新月》《独立评论》等报刊发表了罗隆基、丁文江、陈之迈等人阐发专家治国论的文章,《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对美国的 1930 年代专家治国运动和部分专家治国论著进行了介绍,《国闻周报》还发表了反对专家治国论的文章^[11]。专家治国论在争论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内忧外患中的国民政府也开始倾听专家的意见,先后延揽了包括地质学家翁文灏、经济学家刘攻芸、法学家谢冠生在内的一大批专家到政府中任职。由于发生背景的差异,中国的专家治国论一开始就是一种改良主义,“不只强调科学专家的作用,而且强调行政的现代化”^[12]。民国时期的专家不仅包括科学家、技术专家,也包括社会科学专家和人文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建设需要专家,但专家治国论在特殊政治环境中没有生存空间。专家的地位在建国初期虽一度得到提高,但好景不长,随着“反右运动”和“文革”的到来,专家路线被彻底清算,专家的地位降到历史最低点。

改革开放后,随着拨乱反正、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专家治国论又开始抬头。1980 年代末,国内学界重新对专家治国论进行研究,围绕专家治国论的争论也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国内学界对专家治国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概念内涵、思想源流、理论本质、人物思想、思潮与运动等方面^[13]。这些研究除了以“专家治国”或“专家治国论”表述外,还有“技术专家治国论”“技治主义”“专家政治”“技

术统治论”“技术统治主义”“科教兴国论”等多种表述形式,但它们对应的都是“technocracy”一词。除了概念表述的差异外,国内学界对“technocracy”的理论实质、专家主体理解也不相同,其中,对专家主体存在三种不同的认知:

一是将专家理解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例如,陶文昭认为,“专家治国是指在一种政治制度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行政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14]。李醒民指出,技治主义缺乏管理现代社会的管理学、政治学等其他诸多必要知识和素质,“忽视了政治领导所应该具备的其他基本品质”,主张“消除以客观性为标识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是人类唯一的知识的神话”,必须认识到关于社会和人的知识是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所不可或缺甚至更有意义的知识^[15]。

二是在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后面加上社会科学专家,特别是经济、管理专家。例如,刘永谋等人认为,专家治国论的基本主张“接受了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包括社会技术专家)来掌控权力”^[16]。蔡海榕、杨廷忠在阐述专家治国论话语和学术失范问题时,用贝尔的话说明什么是专家治国论,其中的专家包括经济学家^[17]。

三是将专家进一步扩大为全体知识分子。谌中和把专家等同为一般知识分子,并认为《洪范》是一部专家治国的教科书^[18]。谷宇也是把专家等同为一般知识分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公务员队伍专业化的定位问题^[19]。

随着越来越多的具有理工和经济背景的专家进入中央和地方政治高层,专家治国在世纪之交一度引起争论。但是,无论是赞成专家治国的人,还是反对专家治国的人,他们所理解的治国专家包含了社会科学专家乃至人文学科专家。例如,党国英在《成就专家治国》一文中所说的专家就包括经济专家^[20],肖重斌在《置疑专家治国》一文所说的专家也包括经济专家^[21],而王建军在《专家治国,亦可误国》所说的专家还包括人文领域的专家^[22]。

在一般媒体或公众的理解中,治国专家也包含了社会科学专家。例如,《南风窗》上有一篇文章题为《“科技治国”时代的“专家内阁”》,文章中介绍“专家内阁”成员就包含了一位金融专家^[23];新华每日电讯上有一篇文章题为《“专家治国”存废搅动欧洲》,文中所说的专家是指经济专家^[24]。

三

毫无疑问,治国专家首先指的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虽然从字面意思看,“technocracy”的主体仅指技术专家,但是,所有专家治国理论所说的专家都不仅仅是技术专家,而是包括科学家。这里涉及科学与技术的复杂关系。自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原本各自独立发展的科学和技术进入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发展阶段。特别是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生产应用”的新模式,以至于不少人把现代技术看作是科学的应用。因此,在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代社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相互包含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治国专家理所当然地包括科学家。

将治国专家锁定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这仅仅是部分专家治国论者及相关研究者的观点。问题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是不是治国专家的唯一主体?如前所述,不少学者认为,治国论专家还包括社会科学专家,特别是经济、管理专家。如果治国论专家包括社会科学专家,那么,社会科学专家作为治国专家的合法性何在?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治国的合法性。这就涉及专家治国论的基本观点及其逻辑论证。虽然各种版本的专家治国论差异很大,但其基本观点大致可以这样概括: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社会,为适应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需要调整自身的结构,按照科学原则来组织,用技术手段来管控,而掌握科学知识、具备技术能力的科学

家、技术专家自然成为接管社会权力的主体。

这种观点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自 17 世纪以降,放逐神学的科学逐渐取得了作为真理最为可靠形式的无可争议的威望,某种意义上,“‘科学的’和‘现代的’实际上成了同义词,而且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说,‘科学的’这个词都是有价值的”^[25]。因此,以牛顿力学范式为表征的科学话语逐渐超越人类的认识领域,而向其他领域殖民。与之相伴,技术也已“不再是目的的手段,而是本身参与到自然、现实和世界的构造中”^[26]。这两种重要的历史转变共同要求一个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社会及政治设计方案。在这种方案中,“理性—合法”权威要取代传统的权威形式,专家的技术支配要取代官僚的世袭支配。专家治国论则正是这种方案最初的设计图纸之一,而在这份图纸之中,专家主体也仅指能够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内垄断对于真理的解释与实践权力的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专家治国论隐含的逻辑前提为科学是真正的知识,技术是最有效的手段,没有科学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它洋溢着技术乐观主义。

科学技术的渗透与扩张内在地要求整个社会理性化:“理性的核算、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和由此产生的理性的经济道德、理性的精神、以及生活态度的理性化”^{[1](P372)}。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实现程度的不断加深为整个现代性世界图景的展开提供了动力学基础。在知识领域,它促使社会学学科纷纷开始实证化的进程,将向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靠拢视作摆脱哲学与人文母体最为有效的途径;而“在工作与经济的亚政治领域,我们创造了一个科层制和装配线的工具理性化的世界,一个专业化的人和标准化的产品的世界”^[27]。“实证化的知识”“专业化的人”“标准化的产品”共同支撑着一个随时均在理性化峰值运行的社会,一个凡勃伦与泰勒所勾画的工程秩序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社会。在这些领域中,专家们依据“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以最精确的方式计算目的与手段”^[28],进而建立起一套关于决策与选择的完

整的技术体系。而这种对社会全面的规划、控制又进一步促使更多的经济、社会、法律人员加入到权力部门之中,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一道成为不同权力场域中的游戏掌控者。以至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政策评估、开支预算、社会测量、民意调查、心理咨询等诸多的社会技术形式连同与之相关的专家话语共同建构了人的生活常态。“技术已经不只是机械‘力’的凝结器,而是社会的人的工艺学”^[29]。总之,只要知识“科学化”、手段“技术化”,这种知识和手段的主体就成为专家,从而可以加入治国专家的行列。

至于人文知识分子要想成为治国专家中的一员,就必须证明其知识是科学的、其手段是技术的,亦即知识分子必须“专家化”。专家治国论不同于“贤人政治”,尽管专家治国论在 1930 年代东渐之初就受到我国学界、公众乃至国民政府的接受与认同并产生不小的影响,的确与儒家传统中“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贤人政治理念有一定的关系。“贤人政治与专家治国论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注重专业精神,前者讲求对经典的体认和个人道德修养的表率意义,把政治问题道德化;后者则强调个人的智慧才能和科学一素养,把政治问题技术化。”认为治国专家包含人文知识分子,要么是误将专家治国论等同“贤人政治”,要么是认为人文知识分子也已经或正在“专家化”。

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家化”是人文学科在强势的科学话语前被迫做出改变与调整的表现。尽管人文学科因其自身的思辨特性而无法完全实现方法论上的实证化与应用层面上的技术化,但它仍然接受了大量来自自然科学的学术术语,并致力于在自身的话语范式中移植和嵌入这些科学术语中所隐含的逻辑前提与文化偏好,同时在学术体系的建构上也几乎全盘接受了源自于科学的组织方式与分科原则,从而在碎片化的繁杂领域划分中丧失了自身的统一性,致使其重要的批判功能也遭到了扭曲。

治国专家从科学家、技术专家扩展到社会科学专家乃至人文知识分子是整个社会深度技

术化的结果,是人的技术化生存状态的表征。技术的扩张与渗透使得许多原本属于非技术的领域不断技术化,与此相适应的则是知识分子不断的“专家化”。知识分子的“专家化”表明,唯科学主义的市场仍旧不断扩张,工具理性的渗透日益深广,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逐渐丧失,而恢复与重构应有的人文价值理性与批判精神也日益紧迫。

[参考文献]

- [1]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 [2] Howard Scott. History and purpose of Technocracy [M]. Technocracy INC Ferndale,1984:22.
- [3] Thorstein Veblen. The Engineers and price system [M]. New York;B. W. HUEBSCH,Inc. 1921;60—61.
- [4] 傅殷才.加尔布雷思[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78.
- [5] 樊玉红,万长松.20世纪20年代苏联“专家治国运动”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343—348.
- [6] Val Dusek.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 Introduction [M].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2006:48.
- [7] 刘永谋.论技术主义:以凡勃伦为例[J].哲学研究,2012(3):91—97.
- [8] R·S·米尔恩.东盟国家的专家治国论者和政治[J].东南亚研究资料,1984(4):14—27.
- [9] Eduardo Dargent. Technocrac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The Experts Running Government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3.
- [10] 王德禄,刘志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专家治国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2):24—31.
- [11] 邓丽兰.20世纪中美两国“专家政治”的缘起与演变——科学介入政治的一个历史比较[J].史学月刊,2002(7):74—79.
- [12] 邓丽兰.南京政府时期的专家政治论:思潮与实践[J].天津社会科学,2002(2):115—121.
- [13] 周千祝,梅其君.国内“technocracy”研究述评[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8):11—16.
- [14] 陶文昭.论信息时代的专家治国[J].电子政务,2010(8):76—82.
- [15] 李醒民.论技术主义[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1—5.
- [16] 刘永谋,仇洲.技术主义与当代中国关系刍议[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6—20.
- [17] 蔡海榕,杨廷忠.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和学术失范[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2):95—100.
- [18] 谌中和.《洪范》——专家治国的教科书[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2(3):91—95.
- [19] 谷宇.对西方“专家治国”理论的一点思考[J].理论界,2004(1):158—160.
- [20] 党国英.成就专家治国[J].领导文萃,2003(8):36—38.
- [21] 肖重斌.质疑专家治国——兼与党国英先生商榷[J].中国经济快讯,2003(20):26.
- [22] 王建军.专家治国,亦可误国[J].领导文萃,1999(4):24—27.
- [23] 肖霄.“科技治国”时代的“专家内阁”[J].南风窗,1999(3):32—34.
- [24] 吴黎明.“专家治国”存废搅动欧洲[N].新华每日电讯,2012—12—12.
- [25]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3.
- [26]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7.
- [27] David Tabachnick, Tovia Koivukoski.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Philosophy [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4:114.
- [28]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42.
- [29] [苏]格·姆·达夫里扬.技术·文化·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88.